

口述

种棉花

□ 魏翊恩

我们家种棉花,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,但我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1981年,我老家阳谷县阿城公社陶城铺村实行生产责任制,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,第二年打的粮食就够吃了,第三年有了余粮。我父亲买了几口大缸,个个装满了粮食,他说:“不冷备衣裳,丰年防灾年。”家里有了够吃三年的小麦了,才开始把多余的粮食卖掉。1985年前后,聊城地区各级政府号召农民“要发家,种棉花”,种棉花成为当时农民致富的第一选择。

种棉花是一项技术性强且劳累的农活。一开春化了冻,农民就开始整地了。家家先是把冬天拾来的粪和积攒的土杂肥运到地里。没有牲口的人家就靠铁锨,一锨一锨地把地翻起来,几亩地就需干半个多月。农历三月初,选晴好的天,家家把棉种晒了又晒,为的是提高发芽率。开始种棉花了,先把棉种催生出芽来,再集中种植。为节省棉种,户户都实行点种。种棉花的时候,全家老少齐上阵,有刨坑的,有放种的,放眼田野,真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农耕图。我们村盐碱地多,棉花出苗率低,有时不得不补种,补种还不行就移栽,千方百计地把苗搞全。有一年刚种下棉花,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,棉花地里一片汪洋,我们一家人挖沟排水,忙得饭都顾不上吃。几天后,能进地了,就人手一把锄,小心翼翼地松土。松土不能太深,深了易伤到棉苗;也不能太浅,浅了棉苗出不来。有时蹲下来,跪着、趴着用手指轻轻地拨开土块,直到露出又黄又嫩的棉芽后,再用手搓碎土,轻轻地覆盖在棉苗上面。我们就像侍候婴儿一样侍候着棉苗。

棉花从种到收的全过程都需要管理,庄稼人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。棉苗出土后,就要查苗、补苗,接着是间苗。麦收后,棉花进入快速生长期,治虫、施肥、整枝打杈各项管理都得付出艰辛的劳动。那几年棉铃虫有了耐药性,一遍药打过去,没几天虫子又满了。农药的毒性也越来越强,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味道。喷药时,还不时会溅到身上,吸入鼻中,因喷药而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。那时我家喷药,都是父亲从两里地外挑水,我妻子背着个三十多斤的药桶喷,一天下来,累得骨头都像散了架。后来父亲把地排车前后用木板挡住,车厢里放块塑料布装水,变挑水为用车拉,才轻松些。

整枝打杈是个既累又细的农活。棉花长出第一个枝来,就开始打杈了。枝上长有花蕾的是果枝,没有花蕾的就是荒枝,要把它掰掉。这是个细活,手稍微重一点,棉棵就会“受伤”,从而影响棉花正常生长。整枝就是给棉花“做手术”,要把创伤减少到最低,就得细心加耐心,轻而又巧。每个花蕾下面都有一个“毛耳朵”,不抹掉,就会影响花蕾的生长,每个枝都得仔细检查。烈日炎炎,蹲在棉田里,劳作一上午,棉农个个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

棉花成熟是分期分批的,成熟了的,就需要及时采摘,不然被雨淋了,就

影响了棉花质量。采摘棉花看似轻松,但弓腰一晌、一天,就知道有多辛苦了。看着雪白的棉花,劳累感就会一扫而光。棉花采摘后期是攻坚阶段,棉花桃咧个嘴,就再也开不开了,只能用手去剥,干瘪的棉桃尖十分锋利,稍不小心,就会把手指扎破。

棉花收到家,还要晾晒。家家都把棉花摊在院子里,把差的棉花拣出来。然后运到房顶上,让太阳暴晒几天,直到用牙一咬听到棉籽“啪啪”响了,才收到屋里存放好。我父亲说:“小堆不发霉,大垛才不烂。”有人有车的人家,就随拾随晒随卖。因我远在县城工作,父亲年迈,离收棉花的站点较远,所以我家不零卖。平时将拾来的棉花,晒了又晒,挑了又挑,分开存放起来,一季就卖两三次。

种棉花难,卖棉花更难。那时每个乡镇只有一个收购点,三十多个村庄的几百户人家都去卖,所以排队成了卖棉花的重中之重,有的排一天队都卖不了。“卖棉难”一度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。为少排队,每次卖棉花时,我家头天晚上就打包好,装好车,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就出发。我们村到阿城镇只有一条田间小路,为确保夜行安全,我们绕道东阿县的位山,经高村再到阿城。这样路平坦了,却要多走一倍的路程。我们每次都是在夜色里出发,父亲用手电筒照着前行的路。那一束微弱的灯光,照在乡间小路上,给我们增加了前行的勇气和信心。出村不远,就是足有三十多米高的黄河大堤,拉着千斤重的车子,爬上去实属不易。我和妻子在前面拉,父亲在后面推。累得不行了,我们就停下脚步喘口气。每次要休息时,父亲都拿块石头,当车子停下来,他就用石头挡住车轱辘,以防车子向后滑。我们喘口气后,又一步一“叩首”地向上爬去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能爬上黄河大堤。上了堤,到位山就是一路坦途了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,东方泛白时,我们来到阿城棉站。那些年,有几次我们排队比较靠前,这样就验级早、卖得快。也有几次虽然来得挺早,可还有更早的,前面排起了长龙,卖完就天黑了。最考验耐心的就是排队挨号,车队半天不动,双眼还得紧盯着前面的车辆,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拉开距离,让那些不讲究的人加了号。这个时候,人们似乎忘记了种棉花的辛苦、拉车的劳累,言谈中都洋溢着快乐。

排到号了,我们就得把棉车解开,把棉包一个个卸下,让验级员逐一检查。验级员一脸严肃,弯腰伸手拨开棉花,翻了又翻,还抓出一把棉花,用牙咬了又咬,然后高声宣布等级。得个好等级的,满脸高兴,欢天喜地称重去了。等级差的,大多数人家不高兴,但不敢多说话。卖棉花的人中当然也有偷奸耍滑的,上面放好棉花,差的藏在下面或中间。更有甚者,刚摘下来就拿来卖,湿棉花卖干棉花的价钱。我家可是晒了又晒,挑了又挑的,所以每次等级都是不错的。有一年,我们县种的棉花特别多,为方便农民,棉站在我们村前的黄河修防段里设了一个收购点。我

拉了三包棉花挨到号了,当时天色已晚,验级员问我:“你这几包都一样吗?”我想也没想说道:“这一包比那两包差点。”验级员看了看,两包二级,一包三级。同去的邻居说:“你真实在,咋不说一样啊?少卖好几块!”我说:“咱明知道那一包差,人家给的级别没亏了咱。没吃亏,就是沾光了。”

验级称重后,还得自己把棉花送上棉垛去。那时没有电动输送带,全靠人工背或抬。我家卖棉晚,收购站已经收了很多棉花,棉垛很高了,要把这一百多斤的棉包,抬到高高的棉垛上,必须爬木板。空手走上去都会晃晃悠悠的,胆小的小腿肚子都会抽筋,别说抬着棉包了。我和妻子一个在前拉,一个在后推,艰难地爬上去。一车棉包卸完了,我们都累得像散了架似的。

最后一关,就是结账了。结算窗口没有了车队,只是单人排队。多数人遵守规矩排队挨号,可总有个别加号的,排好的队一拥挤就乱了。每次结账都会遇到因加号而抬杠骂架的,棉站的管

理人员虽然也不时呵斥,但并没有多大用。在窗口不挤上三五个回合是结不了账的。拿到钱和单据,我们才踏上回家的路。轻车熟路,车轮欢快地转动,所有的辛苦、疲劳和汗水都遗忘在乡间小路上。

种棉花的那些年,我家不仅每年有了上千元的收入,而且解决了吃油难的问题。那时家家开始用盛水的缸盛起了棉油,几辈人炒菜用的油釜子下岗了,家家户户放心地用盛饭的勺子舀油。随着“鲁棉一号”优良品种的出现,棉花产量大幅提高,种棉收益明显增加,“万元户”也不再是庄稼人的奢望。我父亲把卖棉花的钱,点了又点,脸上堆满了笑容:“加把劲,咱也争取早日成为‘万元户’!”

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大量农民外出务工,养殖业和蔬菜种植业迅速发展,种植棉花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,可那十几年种棉花的辛苦和丰收后的喜悦,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。

(图片由耿仁国提供。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。)



20世纪80年代,人们在摘棉花



排队卖棉花